◈纵　横

培养健康的责任政治

一种健康的政治，乃是能够对责任与权利这两种原始政治因素拥有充分意识的政治。两个因素共存并形成张力，作为动力推动政治运作。对权利或对责任的忽略和否定，都会使政治进入病态，乃至死亡。也就是说，两种政治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在权利政治的对照下，责任政治可以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反之，权利政治也可以从后者吸取责任意识。双方都将达到一种责任与权利相对平衡的健康状态。

当前中国社会的困境就在于：一方面，它仍以责任政治为取向，另一方面，官员却缺乏责任意识的培养途径。此外，儒家对人性的消极面也有欠缺。儒家鼓励人人做君子，但是对于如何避免做小人缺乏讨论。君子小子一线之隔，人若只依靠自己，难免沦为小人。在这一点上，儒家有致命缺陷，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儒家过去在中国社会治理上长期占主导地位，建构了一种社会心理结构。因此，目前中国社会的惯性仍然在传统的责任政治框架内，而如何培养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就成了政治的重要导向；另外，中国社会应进一步包容个人的权利意识，并在法律和制度上设置基本权利保护机制，使社会成员能够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这应该是一种健康的责任政治。（2015年6月4日《大众日报》谢文郁）

制度建设能力和发展空间

制度的韧性由其内在品质、存在基础、组织结构和价值目标所决定，具体体现为制度的生存能力、发展潜力和实现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韧性，展现了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和广阔的制度发展空间。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这份自信恰恰来源于对其韧性的体认、捍卫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制度整体性的自组织力。其中，主要是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号召力、凝聚力和集中力，有利于社会集中各种资源和力量办大事。二是制度的学习力和借鉴力。在不断完善自身进程中，既能坚持正确方向，也能学习和借鉴他人优秀之处，善于利用高效和新颖的方式获取革新的可能性。三是应变修复能力。通过多样社会运行机制和具有统合力的组织结构，能够对各种变化做出动态应对，在坚持正确、修正错误中不断进步，寻找到最优发展路径。四是策略协调和平衡调控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也会结合实际采取阶段性、分步骤的发展策略，并由此协调配置资源，平衡发展状态，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015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宇文利）

数据就是生产资料

大数据的特征主要包括：一是量很大；二是变化很快；三是变异品种很多，有结构性的数据，像WORD文档，有非结构性的数据，像数据和照片；四是可能有价值。应该说，大数据是价值密度很低的数据集，就是说，可能大数据里面大部分都是垃圾，我们所做的，就是从这些“垃圾”里找出有价值的东西。

大数据需要很好地通过云计算手段来支撑，因为数据量非常大，而且源源不断，没有头也没有尾，我们没办法停下来分析。我们过去分析数据，数据是静止的，我们要带数据进程序，而现在的数据是活的，我们要带程序进数据。大数据不但可以很好地应用，其本身也是一个产业，它可以带动硬件产业、软件产业。广义的大数据应用，本质上是一种“增值分析”，前景有着近似无限的可能，不受任何行业、资源、地域、用户的约束。

大数据服务业属性大于大数据软硬件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大于对信息产业的影响，其社会效益大于直接的经济效益。麦肯锡曾经总结过，只要用了大数据，美国的保健一年能节省3000亿美元，欧洲的管理一年能节省2500亿欧元，服务提供商一年能多赚6000亿美元，零售商可以增加60%的利润，制造业可以降低50%的成本。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曾指出，大数据是新财富，价值堪比石油。麦肯锡说，大数据是下一个创新竞争生产力提高的前沿，数据就是生产资料。由此，大数据还会带动很多就业岗位。（2015年8月24日搜狐网 邬贺铨）

◈观　点

为何主张“两线伦理”

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现代社会的伦理不再是精英伦理而是大众伦理，它设定人们基本的道德义务。与历史上的道德相比，底线伦理接近于一个最小的同心圆，从而形成一种道德底线，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基准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准确地说，将法律的一些技术性成分去除后的基本规范即为底线之伦理。就是伦理学家何怀宏先生所主张的“底线伦理学”。

“底线伦理”应对现代社会因其多元性导致的道德滑坡、伦理缺失现象，不失为一剂良药。然而，伦理学又有别于法律学。法律因普遍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必然具有一种“底线性”，但伦理学在适应于大众的内心约束的同时，还应当具有一种“灯塔”的作用，即为人的精神提供一种指引。因此笔者曾提出“两线伦理”的主张，认为伦理学在主张一种底线伦理的同时，也有必要提出一种以圣洁性为特征的“上线伦理”。在这种圣洁精神的指引下，使有的干部能成为孔繁森，有的普通人能成为雷锋。这样，在社会因底线伦理而维系其规范性和有序性的同时，也能不时闪烁起理想的光芒，使社会显得更加美好。

“上线伦理”在伦理教育方面，肯定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长期以来，国家、不同地区和部门都树立了一些榜样，对推动社会道德伦理建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此类做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均为官方行为，有时还与精神建设方面的政绩工程相联系，也出现了人为拔高的因素。在当今多元化及趋于理性的社会，过去那种一个先进事迹报告就有很多人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局面已经难以再现，受众中无动于衷的可能还不少，还有一部分人也许在想事迹有无“水分”。因此，这类榜样的示范效应受限。

二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有所欠缺。在我国文化社会氛围中，最好的榜样，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否则，再动听的伦理倡导也缺乏说服力，树再多普通干部、群众作为道德模范，也缺乏感召力。然而，这方面的积极示范作用却未能有效发挥，反而常见到一些在公务及生活伦理方面高调发声的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实际行为却打破伦理底线，甚至龌龊不堪。

因此，榜样教育应当加强两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领导机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这是最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榜样作用。要求公而忘私，则首先从领导干部做起；要求遵守公务伦理，则首先从领导机关做起。第二，要重视伦理教育的民间力量和民间作用。应当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伦理建设中的作用，由社会组织和民众自发地提倡公益精神，树立道德楷模。这样树立的榜样具有自然生成、民众熟悉、易于接受的特点，建议相关部门对此种榜样树立路径予以重视。（2015年8月24日《北京日报》龙宗智）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政策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年满16周岁以上的农民工。这一群体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要构成。近年来，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倍加关注，主要是因为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了许多独特的群体特征，其中，创业意愿强烈就是重要特征之一。但是，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却出现了“高创业意向、低创业能力、少创业成功”的情况。

因此，推动这一群体创业，不仅可以促使他们增强城市融入能力，逐渐实现“人”的城镇化，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地方经济增长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为此，笔者就制定与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政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创业需求，构建完善的创业政策体系。

在激发创业动机方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需求“量身”定制适合的创业培训课程，完善创业培训补贴政策，让新生代农民工“学得起、用得上”；加强创业文化培育政策，营造良好创业环境，促使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创业想法。

在提高创业技能方面，一方面通过创业培训政策提高创业者本人的创业技能，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初创企业的政策扶持，通过建设农民工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平台，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同时为初创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创业配套服务。

在增加创业机会方面，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农民工评级授信制度等制度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定期由政府提供一批适合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创业项目，增加创业机会。

第二，创业政策设计要和包容性创新相联系。

一是在创业培训中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技术能力的培训，重点对其进行计算机操作、互联网应用、电子商务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二是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通过电话、短信或网上论坛等方式提供技术、产品营销等专业咨询服务；三是设立一批“草根创新创业”项目，为新生代农民工初创企业提供孵化服务，同时帮助其进行产品开发、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推广等。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政策设计要能够体现新型城镇化需求。

和传统城镇化资源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转移不同，新型城镇化过程强调城乡互动，城市产业和公共服务等资源将会在小城镇及农村社区有效配置，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大量机会。政府如果能够采取措施进行有效引导，则会形成新的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化良性发展。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农民工创业园”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的做法已经取得了较好效果。未来各地在政策设计中，需要进一步将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政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相联系，通过政策引导更多的青年农民工投身创业、实现自身职业发展理想，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2015年第8期《中国国情国力》傅晋华）

◈评　论

防止出现决策内部视角陷阱

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内部视角陷阱。内部视角陷阱是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注重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有意无意地放大竞争优势、忽视竞争劣势而出现的一种决策失误现象。在领导实践过程中，决策内部视角陷阱往往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学习不深，没有意识到把握领导决策内部视角陷阱知识的重要性。二是方法不当，没有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战略形势。三是站位不准，没有学会利用战略思维推动事业发展。因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于带领被领导者实现组织目标的领导者来说，如何避免决策内部视角陷阱，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注重对领导理论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对领导者来说，避免决策内部视角陷阱的知识也是政策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这方面的领导理论知识的学习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一刻也不能放松扩充自己的领导理论知识，避免决策陷入内部视角陷阱，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生动的领导实践中增长才干，加快知识更新，拓宽眼界和视野，着力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其次，把自己当作别人来预测。领导决策之所以会陷入决策内部视角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者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来做决策，而往往忽视了从旁观者的角度，尤其是从竞争对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以至于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贯穿决策过程始终。因此，领导者必须抛弃这样的错误想法，学会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分析问题，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也要善于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别人的优势和不足，做到既辩证又统一，全面客观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努力提高政策、决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本地本部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快速发展，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生价值。

再次，树立战略思维进行决策。战略思维是相对战术思维来说的，前者强调的是做出决策要善于从全局着眼，不能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丢掉了全局的利益；后者强调的是做出决策要善于从局部着眼，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锱铢必较。尽管这两种决策的处置方式没有对错之分，一个注重宏观，一种注重微观，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但是领导者决策之所以容易陷入内部视角陷阱，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树立战略思维，没有运用战略管理做出决策，只会根据眼前利益进行决策，把长远的利益抛诸脑后。因此，领导者要善于从战术思维中跳出来，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训练。通过战略管理的运用向政策决策要成效，摆脱决策内部视角陷阱的束缚，高质量地做出决策，提高领导效能，推动事业发展。（2015年7月下《领导科学》梁国越）

◈史海钩沉

东方主战场上制胜的“压舱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首那段血色历史，人们会发现正义无论起初多么柔弱，最终都会战胜表面上不可一世的邪恶，光明无论起初多么微小，最终都会战胜表面上声势逼人的黑暗。追忆那条艰苦卓绝的胜利之路，人们会发现代表和平正义的军队，只要坚持正义、勇于反击、智用战术、注重联合，最终都能赢得胜利。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中国的军队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军队捍卫正义最早，以坚决反抗率先发起反法西斯战争冲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欧洲各国四处都在议论“战争是否还能避免，怎样避免，或者至少怎样能够推迟战争”。当时，人们对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充满忧虑，但英、法当局的对策却是一味退让，再三妥协。英国首相张伯伦，曾为能够第三次去德国同希特勒举行和平谈判而兴奋。整个欧洲弥漫着绥靖主义情绪，好像再退一步和平便能实现。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美、英也奉行过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宣称：“我们不能忽视避免太平洋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主义的威胁，足以诱导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保持另一翼的和平。”在1941年4月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中，美国甚至打算促使“蒋介石政权和汪精卫政权合流”，并承认“满洲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受当时的绥靖主义思想影响，中国国民党政府起初也对侵华日军施行了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短短4个多月时间内，就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的辽阔领土。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第三天就发出抗日救亡的伟大号召，迅速从关内派遣大批党员奔赴东北，组织抗日武装，领导抗日斗争。东北守军将领马占山，英勇打响了抵抗日军侵略的江桥战役，歼灭日军千余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北上抗日，半个月内收复察哈尔省失地。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深入日军占领区组织东北人民以各种形式反抗入侵，牵制和消灭大量日伪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和第5军，英勇反击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日军，艰苦作战一个月，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迫使日军3次易帅，数次增兵。1934年7月，正处于国民党重兵“围剿”下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将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后与方志敏部红十军团会合成立红十军团，准备进行抗日斗争。1936年2月，为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向山西、绥远方向实施东征。到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只身抗战八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

中国军队捍卫正义最坚定，以血肉之躯写下不屈壮歌

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已有了良好的工业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由自己设计与生产，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实行了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士兵受“武士道”精神熏陶和严酷训练，出征前人均打靶数千发，即使乘车行进间射击，也能打中百米内的目标。

而当时的中国武器主要靠外购且混乱无序，仅枪械就来自十几个国家。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主要靠抓壮丁，一些人战前甚至没打过枪；军中派系多、协调难，步炮协同、陆空配合的意识差。1937年，日军下发《作战指导纲要》，一个联队（团）可击溃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

尽管敌强我弱，尽管代价巨大，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军队团结御侮、绝不屈服、视死如归、前赴后继，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反击侵略，誓死捍卫正义。

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宛平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命令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敌4万多，但己方伤亡25万。3个月内，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阵亡一个师。除国民党中央军外，桂军、川军、滇军、湘军、粤军……一支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义无反顾地投入会战的血肉熔炉中。

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军队以自己的巨大牺牲，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抵抗侵略、捍卫正义的决心和勇气。平型关战役，八路军将士把生死抛于脑后，不断向进犯的日军第5师团发起冲锋，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之心。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以伤亡7500人的代价，取得歼敌11万多人的战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证明，中国军队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在侵华日军面前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血肉长城，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树起了奋起反击侵略者的典范。

中国军队配合盟军作战行动最坚决，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军队绝不屈服的抵抗，打破了日本侵华的“速胜”幻想，但仍没有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对侵华日军举行的太原、武汉、长沙等会战，大大损伤和消耗了日军的战力，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士气。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对日军发起百团大战、黄土岭战斗、十字岭战斗、刘老庄战斗、七亘村战斗、韦岗战斗等大范围作战行动，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一次次“扫荡”，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后腿，击碎了日军在华建立发动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幻想，并使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军队旷日持久的抗日作战，牢牢捆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手脚，遏制了日本北进的计划，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发挥了关键作用；迟滞了日本南进的步伐，支持了美英盟军的作战，成为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关键，从而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

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付出6万人伤亡的代价，掩护英军撤往印度，牵制了日本西进；与美军一道实施缅北和滇西反攻，成功打通中印公路，有力配合了印缅战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不断加强“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斯大林感慨道，“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英国首相丘吉尔则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

铭记历史，让和平常驻。面对当今世界不断冲击和平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等非和平逆流，面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否定历史、谋求集体自卫权等军国主义复活倾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加速建设和壮大自己，以足够的和平正义力量遏制战争、惩罚挑衅、保持稳定。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有理由像反法西斯战争中那样，拥护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好亚太和平的“压舱石”。（2015年第14期《国防参考》田义伟）